

# 1931 - 1937: 蒋介石应对日本侵华的军事思想

仲 华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历史学系讲师、博士生 南京 210003)

**摘要:**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期间,是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对华侵略的特殊历史阶段,蒋介石为应对外敌入侵,在军事方面作出了自己的思考。本文根据蒋介石这一阶段的论著,概述了他对于未来战争的认识、他的国防理念、他关于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构想、他的军事教育思想,在此基础上,对这些军事思想及其历史作用,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和评价。

**关键词:**蒋介石;中日全面战争;国防;战略战术;军事教育;军事思想

**中图分类号:** K 265.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 8263(2003)10 - 0039 - 05

1931年至1937年,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特殊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存亡续绝的危难关头。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首脑,他关于应对日本侵华的军事思想,指导着国民政府的备战实践和战略选择,对未来战争进程影响深远。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此问题作出梳理,以求教方家。

## 一、关于中日全面战争的认识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基于种种原因,对日本虽持软弱的外交政策,但其内心深处对中日全面战争的必然爆发一直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事变发生之初,他即在日记中写道:“倭寇野心既已爆发,必难再收,东亚从此无宁日矣”<sup>[1]</sup>;1934年3月,在一次各省高级行政人员会议上,他更预测第二次世界大战暨中日战争将在1937年爆发。<sup>[2]</sup>这一时期,蒋介石对于未来战争的性质、形势、形态等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作出了初步的思考与回答。他认为,即将爆发的中日战争是被压迫的中华民族和侵略的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一场生死大战,也是中国人民的御侮之战;作战双方中,日本“军事完备”,中国“事事落

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呈明显的敌强我弱态势;战争形态较之传统战争,迥然不同,“逼在我们眉睫的未来的国际大战,乃是一幕纯科学的立体战争”<sup>[3]</sup>,而这种战争,“一定是电气的战争、化学的战争、机械的战争、毒瓦斯这类毒气的战争”<sup>[4]</sup>。

如何才能应对并赢得这样一场特殊的战争呢?综观“九·一八”事变起至“七七”事变止蒋介石的有关言论,其对策大致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

其一,科学救亡。1934年5月,蒋介石在向空军官兵发表《空军救国三唯论》讲演中,提出了“二十世纪是科学的世纪,所以我们生存于二十世纪的人们,要不被人家讥笑是个落伍者,只有从事于科学的研究”,“唯有精研科学,始能救亡御侮,复兴民族”<sup>[5]</sup>的论断。这就把科学技术和军队战斗力、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蒋介石科学救亡思想的促动下,国民政府加快了当时科技含量最高的空军建设步伐。经过三、五年的努力,空军建设及与之相关的航空工业建设初见成效。中国空军初步生长为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的新型国防力量,由此为国

民党军队突破以往以陆军为主的单一军队结构,形成一支适应现代战争条件的多军兵种合成军队;突破线式作战和地面作战等传统作战方式,掌握多军种协同的合同作战方式,奠定了基础。

其二,“精神胜于物质。”精神致胜是蒋介石着重强调的一个克敌之道。“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有关革命哲学和立国精神的长篇阔论,屡见不鲜。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上,蒋介石认为,精神为先,物质在次,“我们对外作战,一切物质武器不是胜利的第一要件,而比物质更见重要的,还是民族的精神,革命的精神!”蒋介石还把这个结论套用于日本侵华战争的现实问题,认为日本“用来侵略中国消灭中国的最大武器,并不是有形的枪炮,而乃是枪炮以外无形的精神”<sup>[6]</sup>,此精神,蒋介石界定为“忠君爱国”、“好侠尚义”、“轻生乐死”的武士道精神<sup>[7]</sup>。基于以上的认识,蒋介石进而强调,“我们要打倒日本侵略的野心,要打倒日本侵略的武力,先得打倒他日本侵略的精神。要打倒日本侵略的精神,先要完成自己应该具备的革命精神——固有的民族精神。”<sup>[8]</sup>何谓革命精神和民族精神?概括蒋介石所见,即为“智仁勇”的中国固有民族性以及在这之上延伸出来的“智信仁勇严”的中国固有武德。在蒋介石看来,只要恢复“智仁勇”的精神,“我们有了武德,就不必靠武器,有了武德,就可以发挥出一种超绝的精神的力量,不仅敌人不能以武器来消灭这种精神的力量,而且我们有了这种精神的力量就可以战胜敌人!”<sup>[9]</sup>那么,又该如何恢复民族精神并将之落到实处呢?蒋介石的核心思想是:民族精神“之所以能够发挥出伟大的力量来达成他民族复兴的目的,又全在领导民族复兴运动的领袖,和在领袖指挥之下的一般干部,一般将领,能忠义自矢,服从命令,拥护领袖,为国牺牲,团结精神,共同奋斗”。<sup>[10]</sup>也就是说,中国决胜未来战争的法宝——“智仁勇”精神或“智信仁勇严”武德,归根结底必须依赖于民族领袖蒋介石,必须建立在全国全党全军对其个人绝对服从的前提下。这种逻辑看似荒谬,恰又完全符合蒋介石独裁专制的一贯理念。

战争是综合因素的抗衡,现代战争更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未来中日战争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一部分,将会伴随着世界军事的发展步伐,前进到大规模机械化的战争阶段,在这种形态的战争中,除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因素的影响,科学技术的作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高度,一个国家科技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他们的军队战斗力。从这个角度而言,蒋介石科学救亡的思想无疑是顺应时代潮流和现代战争特点的明智认识。然而,蒋介石提倡的“精神胜于物质”,却过分夸大了战争中的精神因素,使精神变成了凌驾于一切战争条件之上的玄而又玄、虚无缥缈的东西,显然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众所周知,精神力量自古就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但精神力量必须和物质因素有机结合,才会发挥出非凡的威力,精神和物质二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脱离了物质支撑的孤立的精神,绝不可能赢取战争的胜利。所以说,蒋介石的“精神胜于物质”,只能服务于他个人的私欲,而有害于备战的实践,同时,将精神、物质割裂开来的论断,在理论上造成了不可调和的深刻矛盾,这种矛盾处处派生于他的其他军事思想当中。

## 二、关于国防的认识

这一时期,蒋介石的总体国防观受其“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所制约。不过,在“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防秩序下,蒋介石就如何准备“攘外”的思想并非一成不变,其基本国防观念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而有所变化。

1.“精神国防”。“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提出了“精神国防”的思想,其要旨是:以“礼义廉耻”的精义教化民众,使人人修身力行,发扬民族道德,奠定国家的精神基础。1934年,蒋介石在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并把新生活运动和塑造“精神国防”连成一体,他指出:“新生活运动,可说就是要复张四维的运动。再换句话说:也就是精神国防的建设运动!”蒋介石“精神国防”的思想和他“精神胜于物质”的认识密切相关,这是他同一种观念在战争和国防两个不同领域的反映。“精神国防”倡导的“礼义廉耻”四维与“精神胜于物质”推崇的“智信仁勇严”武德,在蒋介石的概念里,也完全相通,它们都代表着中国民族道德,“‘礼义廉耻’是民族道德之体,‘信仁智勇’可以说是民族道德之用。”<sup>[11]</sup>“精神国防”的片面性

不言而喻,事实上,当时蒋介石的主要精力和兴趣集中于江西“剿匪”,其本人长期坐镇江西,国民政府投注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大规模内战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标榜精神国防建设运动的新生活运动的根本目的,在于配合军事的“围剿”,清除思想文化领域的异己成分,加强对人民的独裁统治,其矛头是对内而非对外。因此,“精神国防”与其说是蒋介石在国防准备上的一种思想理念,不如说是他在内战背景下搪塞舆论和欺骗人民的烟幕,对国防和备战并无裨益。

2. “营防”即国防。与“精神国防”同时,蒋介石还提出了一种“营防”即国防的思想。1934年7月,蒋介石在对庐山军官训练团所作《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讲演中指出:“现在我们没有国防,日本人亦不许我们建设国防”,“我们现在既不能讲国防,就要讲营防,我们每一营一连所驻扎的地方,一定要将工事做好,我们的军队每到一个地方,必须步步为营,处处严防,我们的营防,就是我们的国防。”<sup>[12]</sup>这里蒋介石所指的“营防”,并不局限于营级单位的防务,关于“营防”的内涵,他阐述为:“我们自己平时全国有一个相当的整个准备,随时随地能够挖壕、囤粮、积谷,军队到一个地方,立即设防,一营有一个营防,一团有一个团防,一城有一个城防,随时随地准备,利用所有的物质,所有的人力,来和他抵抗”<sup>[13]</sup>。和不切实际的“精神国防”相比,“营防”即国防的观点明显前进了一步,不过,它的弱点也显而易见。在军事上,这种国防观只能表现为当敌人深入腹地之后,我方进行的被动的、应付式的消极防御;在政治上,这种国防观与蒋介石依赖国际社会开展对日交涉,企图达成绥靖目的的活动相呼应,蒋介石认为,“营防”即国防奏功的关键是拖延几个月的时间,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美英等国的援手,胜利自然唾手可得。基于这一点,“营防”即国防又是投机的、充满依赖性的,而不是独立自主的国防思想。

3. 初步务实的国防。进入1935年以后,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动。首先,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从东北进入长城一线再至华北,越来越严重地危害着蒋介石的统治及美英等国的在华利益;其次,中国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自赣、闽苏区实行战略转

移,蒋介石认为,经过“围剿”和“追剿”,红军“已损失十分之九的实力”<sup>[14]</sup>,“安内”取得了重大的阶段性成果;再次,全国各界要求抗日的呼声此起彼伏,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势不可挡,“抗日”已变成中国的时代最强音。所有这一切,影响着蒋介石的决策,使他的抗战决心日益坚定了起来,并终于在1935年国民党五全大会上第一次表现出了对日本的强硬姿态。与此同时,蒋介石的国防观也出现了重大变化,在《现代国家的生命力》、《全国总动员的要义》等讲演中,他重新阐释了国防的内涵,“现代之所谓武力,乃包括国家所有的国民,人人应参加战争,致力国防;所有一切的物质,那怕一草一木,皆为战争与国防之所需,莫不为武力之要件。所以广义的‘武力’,不仅是教育与经济皆包括在这武力之中,凡是学术、政治、外交、文化、军事、思想,尤其是主义和其他一切精神与物质的力量,亦皆包括在武力之中。”<sup>[15]</sup>可以看出,蒋介石这里所指的国防,是一种涵盖着国家生活方方面面的庞大体系,已经接近于现代国防概念的题中之义。在此基础上,蒋介石进一步指出,要想达到国防的目的,必须通过“全国总动员”的方法,全国实行“组织”和“统制”,大家分工协作,层层节制,辅以严明的纪律,最后形成严密、强大、健全的全军军事化的组织。虽然此时蒋介石的国防思想还相对笼统,但由虚妄回到现实,由消极转为积极,开始着力从现代战争规律入手思考国防问题,已是不争的事实。正是在蒋介石初步务实的国防思想指导下,国民政府的国防准备工作于1935年迈出了切实有效的步伐。从1935年起,军事当局重新拟定国防计划,有步骤按批次地整理全国陆军,构筑以首都南京为中心、逐步向国境线推进的国防工事体系,加强交通、通讯、卫生、补给等后勤建设,调整和扩大兵工生产,在国防上作了一定的布置和准备。这些布置和准备,为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存储了支撑作战的重要潜力。

### 三、关于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

自“九·一八”事变爆发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前,“攘外必先安内”不仅一直是国民政府顽固坚持的基本国策,而且也是蒋介石处理内忧外患的总战略。1933年5月,蒋介石曾在《革命军的责任是安

内与攘外》文中谈道：“就我们主观的战略来看，现在我们国内没有安定统一，并且有土匪拚命的捣乱，若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来谋攘外，那我们就是处于腹背受敌内外夹攻的境地了”，“我们如果不先安内而要求攘外，在战略上理论上说，都是居于必败之地，决不能希望胜利，何能达到我们救国的目的，不仅是不能救国，而且适足以速国家之亡。”<sup>[16]</sup>在蒋介石这一时期的著述中，除了对所谓“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不厌其烦的解释和强调以外，关于未来对日战争的战略思考为数甚少。唯一与抗战战略沾边的，是1935年度防卫计划大纲中出现了长期抗战、消耗战略的提法。然而，这时的消耗战略还是着重于消极防御，至于怎样消耗敌人、以何种作战方式消耗敌人、主要在哪个作战方向消耗敌人等内容，均未涉及。可以说，日后抗战中执行的持久消耗战略虽然在此际有了思想上的萌芽，但还远未成形。显然，这时的蒋介石，由于沉迷于内战，无暇对抗战作真正有益的战略谋划。

至于抗战的战术，蒋介石一直非常关注，他强调，“御侮要注重基本技能与基本战术之实练与运用”<sup>[17]</sup>。客观地说，蒋介石本人的战术思想经过了反复思考，是比较系统的。1934年7月，蒋介石发表《御侮图存之要诀》的讲话，将抗战的基本战术规定为“强迫敌人在近距离与我决战”<sup>[18]</sup>。这种基本战术的规定，主要是考虑到作战双方武器水平的差距。随后，蒋介石又在《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讲话中，深化了自己原有的战术考虑，把抗战的战术扩大为六种：“（1）以守为攻。（2）步步为营。（3）就地固守。（4）注意工作。（5）注意游击。（6）军民合一。”<sup>[19]</sup>蒋介石还阐明了这些战术的内容：“以守为攻”就是“取攻势防御”；“步步为营”就是“处处设防，到一个地方，我们就是要挖好极深战壕，修好极固工事，再来休息，不要给敌人可以随便冲入进来”；“就地固守”就是“稳扎稳打，有进无退”；“注意游击”就是利用游击队、义勇队、壮丁等多种形式，开展袭击，牵制敌人主力，收取“用不良的军队，来抵抗最精良的军队”之效果；“军民合一”就是“一定要十分的注重组织民众，训练民众，使全国民众都能军事化，能帮助正式的军队作战，军民真正能合而为一，打成一

片。”<sup>[20]</sup>

蒋介石在这一时期所作的战术构想，当然并不完善。例如，他在提出“强迫敌人在近距离与我决战”基本战术的同时，对怎样执行这种基本战术却含糊其辞：“至于如何强迫的方法，那是讲不尽的，就是编出一本大书也无用，全靠大家随时随地，能够用心研究”<sup>[21]</sup>，没能给予可操作的方法论指导。《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讲话中归纳的六种战术，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先天缺陷，这六种战术是蒋介石总结“剿匪”的经验，借鉴和红军作战的模式提出的，但实际上，由于战争条件的不同，这些经验不具备普遍意义。另外，这时蒋介石一些科学正确的战术思想，如“军民合一”，与他的政治立场背道而驰，蒋介石维护一党专政、个人独裁，必然恐惧国内革命力量的发展，压制群众广泛参与的人民战争，也就不可能真正得到实施。尽管如此，蒋介石对战术的重视还是促进了军队的战术研究和技能训练，他的战术构想大多贯彻落实到了日后的战争当中。“近距离决战”、“以守为攻”、“注意游击”等战术在实战中发挥出了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从而验证了它们的自身价值。

#### 四、关于应对日本侵华之军事教育思想

这一时期，蒋介石关于应对日本侵华的军事教育问题，论述甚丰，形成了一整套的军事教育思想。

第一，关于军事教育的中心。蒋介石提出，“学先立德”，在精神教育和技能教育的二者之间，前者处于中心位置。蒋介石认为，重技能而轻精神的军事教育，“不仅不配算是完善的军事教育，而且不好算是一个普通教育”<sup>[22]</sup>。他屡次强调：“今后我们整理军队救国救民，就要注重军队的基本教育，和精神教育，简单的讲，就是要恢复‘智信仁勇严’之固有武德，恢复我军人自强自立，自重自尊之人格。”<sup>[23]</sup>

第二，关于军事教育的内容。蒋介石提出，“智德体群四育为军队教育之内容”。<sup>[24]</sup>对四育的内涵，他一一加以解释：“知识的增进，便是‘智育’；品德的修养，便是‘德育’；体魄的锻炼，便是‘体育’”，而群育，则是指“大家要统一意志，团结精神，相亲相爱，群策群力，共同一致来努力革命的意思”。<sup>[25]</sup>

第三，关于军事教育的要旨。蒋介石提出，“军事教育有四个要旨，就是‘确实’、‘迅速’、‘静肃’、

‘秘密’”。<sup>[26]</sup>这四者贯穿于军事教育的方方面面,是规范所有军人行动和态度、思想与意志的准绳。四者之中,“确实”意味着准确、实在、不轻浮、不浪漫、不苟且,是提纲挈领、最为重要的,但同时,它们又有着紧密的连带关系,军人必须统一落实,才能实现军事教育的真谛。

第四,关于军事教育的目的。蒋介石提出,军事教育的目的在于达到全军的“共同一致”,这种“共同一致”不仅指形式上的令行禁止、整齐划一,更重要的是要求精神上的“共同一致”,即“确立三民主义的中心信仰”。至于确立三民主义的办法,蒋介石认为,还必须从实践礼义廉耻四维做起,这就是训练我们自己 and 一般部下来实现三民主义的第一步。……主义的义字和礼义廉耻的义字,是同一个意义的,不过前者是讲‘义理’,后者是指‘忠义’,忠义是由义理而生,义理必赖有忠义乃能实现,所以我们要实现三民主义来挽救危亡,复兴民族,必须振作忠义之气”。<sup>[27]</sup>

第五,关于军事教育的实践途径。蒋介石提出,以“礼义廉耻”四维修养人格,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基本科目,方能做到文武合一、术德兼修。其中,“礼”的教育又是占第一位的,因为“礼的范围非常广泛,一个人无论起居饮食,举止言语,小而‘洒扫、应对、进退’,大而‘治国平天下’,随时随地皆应当有合理的态度和规矩,这种合理的态度和规矩就是‘礼’,所以无时无地没有礼,随时随地要讲理”<sup>[28]</sup>，“无论‘四维’、‘六艺’,皆以礼为首要。我们教学生,教部下,必自礼始;礼字做到了,再教其余的科目;这才是根本的教育方法”<sup>[29]</sup>。

蒋介石虽出身行武,靠军队起家,对军队有着比旁人更真切的了解,但他的军事教育思想有失偏颇,根据上文的分析,他将军事教育总体分为术和德,也即技能教育与精神教育两大环节。对于前者,蒋介石也曾强调其重要性,如督促军队利用“空气、日光、水”的自然条件锻炼体能,指出强健的体魄是一名合格军人的基础;再如赋予“六艺”基本科目以新的时代内容,指出,“现在我们军队里,教举手立正种种的礼节,就是‘礼’。教军乐军歌等就是‘乐’。教瞄准射击,就是‘射’。教骑术和驾驶汽车、战车和器械的

技术,就是‘御’。教测量、计算,就是‘数’。教拟计划,写命令、绘地图、讲战史、战术以及一切的典范令,这就是书”<sup>[30]</sup>,这些都契合了现代军事教育的规律,是值得肯定的,但总的来说,蒋介石是把技能教育放在次要和从属的地位,而对精神教育大力宣扬。由于蒋介石早已背弃了孙中山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精髓的新三民主义,他也就不可能继承孙先生用革命主义建军的进步思想,同时他又缺乏其它的先进思想或革命思想,因此只得向落后于时代的封建伦理道德及礼教规范中寻求灵丹妙药。蒋介石把“礼义廉耻”作为精神教育的中心原则,对三民主义偷梁换柱,将二者生硬地拉扯在一起,企图在蒋记三民主义旗帜的庇护下,通过要求军队“重礼义,知廉耻”、“忠君爱国”的教育,建立起军队和领袖之间的私人隶属关系,这样的精神教育当然无法根治国民党军队的病症。

综上所述,从“九·一八”事变至“七七”卢沟桥事变期间,蒋介石的军事思想具有两重性,既有积极的、对未来战争有益的成分,又有消极的、为独裁统治所用的成分,其中处处充满了矛盾和碰撞。正因如此,笔者认为,蒋介石的军事思想很难彻底解决两个紧迫的现实问题:一是不足以应对一场大规模的机械化战争;二是不足以建设出一支精干高效的现代军队,这二者,还有待于全面抗战打响后实践的发展和思想的进步。

注:

[1]《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第275页。

[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2][23][24][25][26][27][28][29][30]《蒋总统集》,1968年台北版,第744页、第763页、第800页、第763页、第764页、第827页、第578页、第778页、第592页、第827页、第827页、第622-623页、第868页、第761页、第797页、第804页、第891页、第907页、第622页、第782页、第782页、第783页、第799页、第802页、第783页、第785页、第767页、第670页、第897-898页、第812页、第817页、第821页、第824-825页、第785页、第821页。

〔责任编辑:兆 录〕